

**编者按** 20世纪中后期,心理学与国际政治相互融合产生了国际政治心理学这一独立的交叉性学科,政治心理学理论成为研究国际政治现象的路径之一。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心理学有了新发展,中国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经验开始受到重视。由于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那么,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如何?如何评价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如何看待此研究的未来发展?本刊特约记者王海媚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尹继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心理学和国际安全与中国外交,著有《政治心理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等。

# 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与 实践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尹继武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 一、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状况

王海媚(以下简称“王”):在一些学者看来,心理学路径似乎不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流,您能谈一下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起源和演变吗?

尹继武(以下简称“尹”):首先要厘清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含义。政治心理学是政治学下面一个独立的交叉性学科,国际政治心理学一般是指心理学或者政治心理学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该学科的研究路径较为宽泛,包括很多不同的流派,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sup>①</sup>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对国际政治议题进行一种比较微观的研究,这些议题包括国际安全问题、领导人与外交决策(决策心理学)、国际冲突、恐怖主义(国内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战略互动等。比如,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论述了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在谈判中的重要作用,<sup>②</sup>就是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战略互动的成果。同一时期,美国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分析了战争发生原因的三个意象(images),第一个意象就是人性,<sup>③</sup>而人性一直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9·11”事件以来,对恐怖主义、美国与中东等国家关系的研究也成为关注的重点。

有人认为,国际政治心理学作为一个交叉性学科,不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流,但在我看来,国际政治心理学关注和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都是与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紧密联系的,比如,现实主义强调的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战争的起源、和平条件和非传统安全研究等;还有与建构主义相联系的社会化研究,包括国际社会化研究和政治学习研究等,都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重点;<sup>④</sup>在对外决策研究中,决策心理学也是该领域很重要的研究路径之一。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议题来看,比如,战争的起源、决策中的认知偏差、领导人的政治心理学、战略互动的心理学、恐怖主义治理、国际冲突、族群冲突等,都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最经典或者最新的命题。可以说,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是主流路径,具有很强的西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传统,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心理学具有较强的交叉性,强调微观路径,这是该学科独有的专业性

---

① 关于国际政治心理学更为一般性的理论知识评述,参见张清敏:《国际政治心理学的流派评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尹继武:《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② 〔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郑志刚、王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

③ 〔美〕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和战争》,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④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特点。

关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起源,一般认为,政治心理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正式奠基,国际政治心理学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该学科的产生有以下四个背景:第一,与现实主义的对话。现实主义者强调物质、结构等确定性因素,对人性等因素没有进行精确地研究和科学归纳,国际政治心理学强调人格、信念、认知、情感等因素,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补充与对话;<sup>①</sup>第二,外交决策心理学的兴起。外交决策分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欧美兴起的,包含很多分析模式和路径,比如心理学路径、官僚政治路径和文化路径等,在这些模式的竞争之中,研究领导人性格、认知和情感的外交决策心理学成为一个重要分支;<sup>②</sup>第三,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对话。1957年,理性选择理论鼻祖、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提出“理性人”或者“经济人”假说,奠定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核心概念,<sup>③</sup>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将“经济人”推进到“心理人”,从理性假定演进到有限理性假定,这是对理性主义的挑战,也是对理性选择理论的一种推进;第四,政治心理学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心理学在研究路径方面经历了阶段性演进,20世纪40—50年代主要进行人格理论(精神分析学)研究,60—70年代占主导的是政治态度与投票行为研究,80—90年代开始进行社会认知、政治信念与决策研究,<sup>④</sup>作为政治心理学的次领域,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演变与之相适应。

**王:**在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注意到建构主义很重视观念的作用,因此,有人认为政治心理学与建构主义很相似,请您谈谈这两者的关系?

**尹:**中国学术界很容易混淆政治心理学与建构主义(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sup>⑤</sup>),认为两者非常接近,但两者存在异同。

从共同点来看,两者都可以被称作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理念主义研究,

① 政治心理学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体现为两个维度,其一是以杰维斯为代表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一般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将领导人的知觉因素纳入进来,强调单元层次的现实主义理论建构。在“社会认同冲突”辩论中,政治心理学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微观基础。参见 Jonathan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2, 1995, pp. 229-252。

② 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国际论坛》2003年第1期,第74—78页。

③ [美]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

④ 尹继武:《政治心理学的争辩议题评述》,《心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11期,第1713—1720页。

⑤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强调软性变量的作用,强调因果作用或者建构作用,而非物质主义的世界观。这个共同点是人们容易把两者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

但是,两者有很大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论流派不同。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这三大理论流派的政治谱系来看,政治心理学属于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一方面,以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为代表的政治心理学学者运用心理学路径,研究心理学变量的作用,为现实主义提供了微观的基础和论证,所以人们一般将杰维斯归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学者;另一方面,随着学科的演进与发展,一些现实主义学者也开始关注心理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就把国内政治,尤其是领导的认知心理因素纳入到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之中进行研究。<sup>①</sup>因此,政治心理学位列现实主义的谱系之下,而后者属于建构主义理论流派。同时,两者的核心概念也有所差别,国际政治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心理学中的基础性概念,包括领导人的人格、领导风格、世界观、认知偏差、情感和认同等,强调领导人和社会民众的心理因素在国际政治中起到的作用,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的观念是社会学概念,并不是严谨的、基础性的心理学概念。

第二,世界观不同。不同的理论流派对政治本质的看法是不同的,同现实主义者一样,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在研究国际安全、国际冲突和战争起源等问题时大多持悲观冲突论,比如,杰维斯在解决为什么战争在本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依旧发生这样的问题时,首先是接受冲突的出现,然后讨论避免冲突的方法。<sup>②</sup>建构主义者大多持温和合作论或者历史进化论,强调合作的可能,认为历史是不断演进的,比如,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分析了无政府体系中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三种文化,认为这些文化是基于不同的角色关系,即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纵观国际关系史,温特推论无政府文化会向着进步的方向不断演进。<sup>③</sup>

第三,研究方法的差异。国际政治心理学借鉴心理学的方法,遵循科学实证主义,主张通过经验观察和测量得出数据,对假设进行验证,是一种自然科学化的研究方法,比如,对历史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对对外政策的文本或者话

---

① 〔美〕兰德尔·施韦勒:《没有应答的威胁》,刘丰、陈永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③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语进行定量分析、引入编码技术测试和考察领导人的人格特质、政治偏好等。<sup>①</sup>建构主义虽然坚持科学实在论,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认知的,但从对建构主义的批评观点来看,建构主义的观点很难通过案例或者实证进行检验,即使是温特的建构主义也是强调建构关系,同样很难因果验证,批判性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更偏向于批判、解构和话语分析,也不是一种科学实在的研究方式。

王:中国学界一般谈到国际政治心理学,就会想到罗伯特·杰维斯及其研究成果,您能谈谈欧美学界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流派和进展吗?

尹:首先,罗伯特·杰维斯的确是国际政治心理学领域最知名的学者之一,因为他在认知领域的研究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但是,如前所述,国际政治心理学的核心议题和流派非常多元,这个学科经历了阶段性的历史演变,可以看作是多个理论流派的集合。我认为,欧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国际政治心理学人格分析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欧美国际关系学界,对外政策的心理学分析和国家领导人研究开始兴起,这属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个阶段心理学研究的主流路径是精神分析学说和行为主义研究,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主要借鉴精神分析学说对重大的国际政治变迁和重要领导人的人格特质进行研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较为分散,但也不乏经典之作。1956年,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和他的妻子朱丽叶·乔治(Juliette George)出版了《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一书,乔治夫妇认为威尔逊的幼年成长经历对其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父亲的严厉导致威尔逊的自信不足,需要通过追逐权力来弥补这种自卑感,而在获得权力后,他会变得固执己见、毫不妥协,这种性格特点在威尔逊个人发展和政治生涯中反复出现,对他个人及美国的国家政治和对外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和新泽西州州长期间,威尔逊固执的个性曾使他遇到挫折,在担任总统期间,由于没有处理好与国会的关系,导致他提出的国际联盟方案没有获得美国国会的通过。<sup>②</sup>《总统人格:

---

<sup>①</sup> 关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参见石之瑜:《当代政治心理学的教材与方法:文献简介》,(台湾)《政治科学论丛》1999年第10期,第27—58页;蒲晓宇:《政治心理学》,华世平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205页。

<sup>②</sup> [美]亚历山大·乔治、朱丽叶·乔治:《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张清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一书试图从威尔逊的人格特质中解读他在政治生涯中的行为模式,是迄今为止最知名和最有影响的心理传记学研究。美国学者詹姆士·巴伯(James Barber)和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所著的《总统的性格》和《总统风格》都是研究领导人个性的作品;<sup>①</sup>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在著作《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根源》中对印度领导人甘地进行精神分析,探析他如何在精神上和政治上成功动员印度人民。<sup>②</sup>1935年,美国政治心理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出版了《世界政治与个体不安全感》,<sup>③</sup>从精神分析角度探讨战争爆发前整个世界政治中的个体焦虑和社会心理,这本书虽然没有直接分析战争起源等问题,但反观当前“特朗普现象”“英国脱欧”等问题的出现,拉斯韦尔的思想对研究当今世界的社会心理变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二阶段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认知研究阶段。从20世纪60—70年代起,以杰维斯为代表的学者们借鉴认知心理学理论,研究国际政治中的错误知觉或者认知偏差。杰维斯对知觉与战略互动的开创性研究对国际政治心理学认知流派具有奠基性作用,他有两本代表作,第一本是197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借鉴了20世纪50—60年代托马斯·谢林的理论精华,以及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印象管理理论,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丰富的历史案例,研究国家间的战略互动问题,以及在战略互动中一国如何向别国投射真实或者虚假的形象,影响别国对该国看法,<sup>④</sup>这项研究非常具有理论性和启发性。第二本是1976年出版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也是国际政治心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作品,这本著作研究的是与第一本书紧密相关的另一个战略过程,即接收别国投射的形象,产生对别国看法的过程。作者在书中分析了领导人的认知心理及领导人知觉形成的动力机制,详细论述了错误知觉的类

---

① [美]詹姆斯·巴伯:《总统的性格》,赵广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美]弗雷德·格林斯坦:《总统风格》,李永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 [美]埃里克·埃里克森:《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中央编译出版社已推出“心理传记译丛”,并组织了多期心理传记学年鉴。关于心理传记学更为一般性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参见[美]舒尔茨主编:《心理传记学手册》,郑建虹等译,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世界政治与个体不安全感》,王菲易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

④ [美]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

型及产生这些错误知觉的原因。<sup>①</sup>两本书研究战略互动的两个紧密相连的过程,即信号表达及其解读。这一阶段还有一些代表性学者,比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奥利·霍尔斯特(Ole Holsti)教授在《危机、升级与战争》一书中分析了在危机情况下做出外交决策时会发生哪些错误判断,并在《认知动力和敌人形象:一项案例研究》中基于认知相符理论,分析为何杜勒斯持有对苏联“内在邪恶”的信念无法改变;<sup>②</sup>哈佛大学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教授将计量方法引入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注重研究政治系统中的决策活动和信息沟通。亚历山大·乔治在这一阶段也有理论创新,1951年,兰登公司的内森·莱特(Nathan Leites)研究员研究苏联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信仰时提出了操作码(operational code),但并未得到重视,乔治使用操作码分析苏联的政治信仰和领导人的政治风格,使操作码更加概括化和系统化,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这个新的心理学研究路径。<sup>③</sup>此外,乔治的研究涉猎非常广泛,还包括领导人如何利用政府内部的信息系统做出政治判断,以及冷战期间美国对威慑政策的使用等。由于乔治在政治心理学领域贡献突出,1994年,美国《政治心理学》刊发了亚历山大·乔治研究成果专刊,2004年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设立了“亚历山大·乔治图书奖”,颁发给上一年度政治心理学领域最优秀的图书。<sup>④</sup>除领导人个体的错误知觉,决策小团体的思维特性及其危害受到关注,心理学家贾尼斯的研究是这一领域的经典。<sup>⑤</sup>

第三阶段是国际政治心理学中的情感研究阶段。从20世纪70—80年代起,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情感与情绪等心理因素,这属于国际政治心理学最新的、也是最前沿的研究阶段。这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

第一,情绪(情感)的非理性研究时期。这一时期,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认

①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② Ole R. Holsti, *Crisis, Escalation, War*, Montreal and Lond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Ole R. Holsti,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i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 No.3, 1962, pp. 244-252.

③ 尹继武:《认知心理学之于国际关系研究:进步及其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前沿与热点》(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一届博士论坛),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95—96页;Alexander L. George,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Making,"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3, No.2, Jun. 1969, pp. 190-222.

④ 张清敏:《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里程碑:评〈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美国研究》2014年第2期,第121页。

⑤ [美]欧文·贾尼斯:《小团体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张清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

为,情绪和情感是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因素会对国家领导人的决策产生负面作用,匹兹堡大学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教授、耶鲁大学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教授等学者引入情绪的变量来分析认知偏差,解释了认知偏差为什么会产生。1977年,贾尼斯在《决策》一书中指出,自满、消极回避和焦虑等情绪会影响人们做出决策;1981年,勒博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国际危机的特性》一书中分析了很多国际危机的起源和政治过程,并讨论了防御机制、压力和情绪是如何影响国际危机的起源和升级。<sup>①</sup>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集中讨论情绪作为非理性或者有限理性因素对认知产生的负面作用,而在杰维斯的研究里面基本没有涉及情绪和情感对于错误知觉的作用,2004年,杰维斯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时提到,令他遗憾的是在当时没有意识到情绪和情感的重要性。<sup>②</sup>

第二,情绪(情感)的理性研究时期。冷战结束以来,人们开始对情绪和情感的作用进行再思考,同时,借助认知神经科学或情感神经科学的先进实验技术,人们了解到大脑的内部结构和工作机理,国际政治心理学学界得以重新讨论情感 and 认知的关系,解决了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等哲学家一直试图解决的情绪与理智的关系问题。<sup>③</sup>该时期,对于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有两个基本观点:其一,情绪是理性产生的必须要素;其二,情绪可以发挥战略性作用。比如,有的病人大脑受到损伤,丧失了产生情感的能力,他们的理性决策判断也会受到很大伤害。对负面情感的战略性作用,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分析了恐惧的进化作用,并在国际政治中进行系统的论证,认为负面情绪对于个人的生存和国家安全是必需的,而这种恐惧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对别国意图存在猜疑,所以,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不大。<sup>④</sup>愤怒、内疚等情感也有重要作用,比如,愤怒可以传递某国的政治敏感性及其偏好;德国向以色列的道歉和

---

<sup>①</sup> Irving Janis and Leon Mann,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7; Richard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勒博后期对于前景理论的逻辑有些推进,参见〔美〕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陈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sup>②</sup> Thierry Balzacq and Robert Jervis, "Logics of Mind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A Journey with Robert Jervis,"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4, 2004, pp. 564-565.

<sup>③</sup> 〔美〕安东尼奥·R.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毛彩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Joseph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sup>④</sup> 唐世平:《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3—41页;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董杰旻、朱鸣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赔偿表达的是一种内疚的情绪,这种内疚并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但从长期来看,这改善了两国的关系,使他们从历史上的敌对关系转变为现在的盟友关系。<sup>①</sup> 还有学者对国际政治领域的情感进行系统说明和分类,比如,将情感分为积极情感(团结、友爱、信任等)与消极情感(仇恨、恐惧、愤怒等),或者将情感分为个体情感(领导人的情感)和集体情感(决策团体、民族国家、社会公众以及国际体系的情感文化等)。牛津大学郝拓德(Todd Hall)副教授等人借助于情感心理学、音乐等领域的划分,将国际政治中的情感区分为状态情感和基调情感,状态情感是即时性的情感,基调情感是固定性的情感,状态情感经过长期累积和沉淀,可以转化成基调情感。<sup>②</sup>

情感的理性研究与一些传统核心议题相结合,使威慑、信念和信任等概念得以重构,具体包括:国际危机、和解问题、人道主义救援、道歉外交和领导人首脑外交(面对面外交)等。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主要强调情感的理性与战略作用,对国际关系中如何研究情感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说明,代表性人物有杰维斯的两位学生:华盛顿大学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教授和布朗大学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教授,<sup>③</sup>他们将神经科学的前沿研究引入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还有更为年轻的国际关系学者郝拓德和俄亥俄大学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副教授等。

## 二、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进展和创新

王:请您介绍一下,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是如何兴起和发展的?

尹:冷战结束以来,政治心理学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逐渐兴起,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不断深化和制度化的结果。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兴起背景大致有四个方面:

<sup>①</sup> Todd Hall, *Emotional Diplomacy: Official Emo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sup>②</sup> 关于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参见[加]郝拓德、[美]安德鲁·罗斯:《情感转向:情感的类型及其国际关系影响》,柳思思译,《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40—56页。方鹿敏、尹继武:《情感与国际关系研究:主要路径与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16日。

<sup>③</sup> 相关代表性作品参见 Rose Mcdermott, "The Feeling of Rationality: The Meaning of Neuroscientific Advanc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i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 No.4, 2004, pp. 695-696; Jonathan Mercer, "Emotional Belief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4, No.1, 2010, pp. 1-31.

第一,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成熟的推动。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西方国际关系的主要流派有了基本的了解和认知,中国的国际政治心理学作为其中一个分支发展起来。

第二,国际社会现实的驱动。中国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不仅是理论上的研究,还与国际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国际政治谱系传承下来的经典问题和当今国际社会重大问题,以及突发性事件,包括恐怖主义的爆发、冷战后地区性的国际冲突、领土争端、民族主义高涨、大国之间战略信任的建构、国际冲突中的信号表达和首脑外交等,都需要从微观的政治心理学角度进行剖析。中国学界研究比较多的公共外交也与政治心理学有密切联系。

第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路径的多元化需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引进和消化阶段主要聚焦于主流的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存在一定的局限,这为政治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研究路径的引入提供了可能性。

第四,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在王逸舟、张清敏、秦亚青等学者和我本人引介西方学界国际政治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代表人物和代表作的基础上,<sup>①</sup>经过一定的消化和吸收,中国的国际政治心理学进入了发展和创新阶段。近十年来,西方主流学界关注的议题,比如情感和情绪的战略作用等议题,中国学界也在普遍关注。<sup>②</sup>

王:中国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有哪些特点?中国学者对此有哪些贡献?

尹: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从兴起发展到现在已历经30多年,在我看来,这项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sup>③</sup>

---

① 晓端:《人性与国际关系》系列文章,《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4、5、6期;秦亚青:《罗伯特·杰维斯及其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载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217页;石之瑜:《当代政治心理学的教材与方法:文献简介》,(台湾)《政治科学论丛》1999年第10期,第27—58页;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国际论坛》2003年第1期,第39—45页;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流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第18—23页;张清敏:《“小集团思维”: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模式》,《国际论坛》2004年第2期,第74—78页;李存娜:《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国际论坛》2006年第3期,第1—6页;林民旺:《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62—68页;蒲晓宇:《政治心理学》,载华世平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205页。

② 在学科知识译介中,除秦亚青早年将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翻译并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出版外,其他大部分作品都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和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政治心理学经典译丛”中得以向国内学界译介的。

③ 在此,我对中国学术界的主要研究及其贡献进行评述,或许会遗漏一些方向的研究。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方面,比如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等,实际上均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心理的核心概念,但它们均不是政治心理学研究。

第一,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紧密结合。这是近十年来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特色,比如,外交学院的师生长期将温特的建构主义与政治心理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实现了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的结合。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实现了一定的理论创新,比如,重构了情感与身份的关系,身份是建构主义理论中的概念,但从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考量,建构主义中对身份的研究存在不足,而中国学者将身份与关系、情感等因素相结合开展研究,拓展了原有的建构主义理论。<sup>①</sup> 身份政治的讨论成为政治心理学与主流建构主义结合的核心路径,陆军航空兵学院景晓强副教授等人对比了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对于行为体身份建构的不同路径,也进一步分析了情感驱动身份稳定,推动国家制定合理的身份管理对外政策。<sup>②</sup> 另有研究将面子、身份与情感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动力,并考察了晚清中国外交变迁的案例。<sup>③</sup> 秦亚青将“过程”和“关系”这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进行概念化处理,将过程定义为运动中的关系,并强调过程的自在性及对国际规范、国家身份和认同的建构作用。<sup>④</sup> 中国学界还重新探讨了规范传播与情感之间的关系。西方建构主义对于规范研究很深入,但没有将情感因素考虑进去,有中国学者将二者联系起来,探讨其中的逻辑关系。外交学院聂文娟副教授在《非盟与东盟人权规范的比较研究》中对非盟和东盟地区的规范建构案例进行对比研究,指出“非盟和东盟不同的怨恨情感影响了二者各自的人权规范认知进程和集体身份建构进程,最终二者形成了不同的人权规范认同”。<sup>⑤</sup> 近些年,情感与身份是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议题,这既与建构主义实现了紧密结合,也创新了传统策略与决策分析的微观基础,比如情感动员及其策略是恐怖主义、选举政治中的核心议题。<sup>⑥</sup>

第二,对传统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重构。唐世平在《安全困境:一个概念性的分析》一文中对安全困境概念进行深入整合和系统梳理,创造性

① 季玲:《国际关系中的情感与身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 景晓强、景晓娟:《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行为体施动者:基于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的分析》,《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01—110页。景晓强:《身份、情感与对外政策:以本体安全为中心的讨论》,《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57—68页。

③ 景晓强:《身份危机、面子与对外政策》,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④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

⑤ 聂文娟:《非盟与东盟人权规范比较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i页。

⑥ 柳思思:《公众情感引导机制研究:塔利班与美国对阿富汗的公众情感引导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2期,第58—76页。

地提出安全困境所必须具备的八个特征,这是唐世平整合了西方学者对安全困境的不同理解,运用系统理论提出的一种综合性解析。<sup>①</sup>唐世平还对其他一些政治心理学核心概念,比如声誉、信任、战略保证,以及秩序、权力等社会科学概念进行系统的概念梳理和创新。<sup>②</sup>我本人在《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一项理论性探讨》一文中对战略默契和共识概念进行重新解析,综合建构主义和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关于默契的综合性理论,提出了虚假(部分)共识和真实(完全)共识;消极共识和积极共识等概念,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共识的国际效应。<sup>③</sup>另外,我对盟友信任的类型进行划分,分为工具性信任、情感性信任和混合性信任三种类型,并讨论联盟形成过程中信任形成的理性主义机制和社会归因机制。<sup>④</sup>

第三,跨学科借鉴较为丰富。中国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学中寻找理论资源,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家国天下的逻辑与西方国际秩序的逻辑之间的不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面子”和“人情”等概念等重构西方的情感政治逻辑。比如,秦亚青将“关系”置于动态的理论框架之中进行研究,提出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阎学通借鉴先秦国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政治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对中国获得世界主导权的重要意义,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尚会鹏系统研究了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L. K. Hsu)的理论学说,“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体系,诸如伦人对外关系模式、‘服国’的国家政治形式以及包括‘亲人文化’、‘熟人文化’和‘生人文化’的天下体制世界秩序观……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心理文化学路径”。<sup>⑤</sup>唐世平运用演化心理学的理论,系统考察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与战争及制度的起源,综合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动态社会进化理论,在其理论中展现了国际社会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转变。<sup>⑥</sup>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包括秦亚青

---

①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18, No.3, 2009, pp. 587-623.

② 相关著作(包括未发表的工作论文等),可参见唐世平的个人主页:<http://www.sirpa.fudan.edu.cn/?p=9385>。

③ 尹继武:《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一项理论性探讨》,《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1期,第33—55页。关于单边默契与虚假共识的理论研究,参见尹继武:《单边默契、信号表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第4—33页。

④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尹继武:《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21—39页。

⑤ 尹继武:《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心理文化学路径:评〈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146页。

⑥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

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sup>①</sup>阎学通的《借鉴先秦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sup>②</sup>唐世平运用进化心理学系统构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sup>③</sup>尚会鹏和游国龙的《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sup>④</sup>张清敏等人的《中国对外行为的思想根源探析》、<sup>⑤</sup>黄光国的《儒家文化与国际政治中的“脸面”动力》<sup>⑥</sup>和蒲晓宇的《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sup>⑦</sup>等。

第四，十分关注中国的外交实践与经验。西方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基本上是“西方中心主义”，主要研究美国的对外政策或者西方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国学者聚焦于古代和近现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实践，研究中国领导人的个性和领导风格。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在《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一文中通过对比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点，剖析两位领导人的人格差异在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型和演变中起到的巨大作用，分析人格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意义；<sup>⑧</sup>格里菲斯大学冯惠云副教授通过操作码分析批判了美国哈佛大学江忆恩教授关于毛泽东是强势的现实主义者而非儒家领导人的观点，她同时认为，毛泽东的行为受到外部环境与威胁的影响：在战争或危机形势下，他的政治信念更为敌对并更易用武；在非危机与非战争时期，他的政治信念本质上是非进攻性的。<sup>⑨</sup>复旦大学林民旺教授运用前景理论和观众成本理论，解释在损失心理下的战争决策行为，并以中国抗美援朝作为案例分析，而王栋以杰维斯的错误知觉理论为基础，讨论了国家利益并不能解释中美在危机中的冲突行为。<sup>⑩</sup>在运用中国经验/中国案例时，对于究

①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4—10页。

② 阎学通：《借鉴先秦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150—165页。

③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

④ 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台北：南天书局2010年版。

⑤ 张清敏、李政窺：《中国对外行为的思想根源探析》，《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3—20页。

⑥ 黄光国：《儒家文化与国际政治中的“脸面”动力》，《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第20—34页。

⑦ 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第34—49页。

⑧ 张清敏：《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第93—119页。其他相关的研究如：张清敏、潘丽君：《类比、认知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54—72页；张清敏：《隐喻、问题表征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2期，第81—100页。

⑨ 冯惠云、李小舒：《防御性抑或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毛泽东的行为代码分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33—40页；冯惠云：《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23页。

⑩ 林民旺：《选择战争：基于损失规避的战争决策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王栋：《超越国家利益：探寻对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的知觉性解释》，《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第27—46页。实际上，运用政治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现实问题，是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韩召颖、宋晓丽：《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决策探析：小集团思维理论的视角》，《外交评论》2013年第2期，第62—77页。

竟是中国案例和中国知识到底是普适性还是独特性,尚未形成共识。“文化差异论”者试图讨论中国文化政治及其国际政治效应的独特性,而“普世论”者认为中国知识反映了一般性的政治心理逻辑,前者以尚会鹏对心理文化路径的研究为代表,后者以唐世平对安全困境、进化心理的研究为代表。<sup>①</sup>

王: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有哪些贡献?

尹: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微观视角。中国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比较重视宏观视角,但在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研究两方面存在不足,而国际政治心理学将人和人性纳入到国际政治研究,有助于弥补这一不足。<sup>②</sup>同时,中国学界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这也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种补充。<sup>③</sup>

第二,国际政治心理学学者借助文化心理学等理论进行研究,有助于实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中国学者能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外交政策实践经验之中吸收理论营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具有创新性的代表正是吸收了文化心理学、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营养,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理论观点。

第三,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重构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理念,这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种创新。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谱系来看,西方学者从理性假定推演到有限理性假定,再到情感理性假定,最后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关系理性假定,中国学者引入“面子”和“关系”等概念所开展的研究是对西方理性假定研究的批判与推进。<sup>④</sup>中国学者对于安全困境、信任和共识等核心理念的重构,有助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前端创新。<sup>⑤</sup>

---

① 关于文化差异与政治心理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生产的关系思考,参见尹继武:《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心理文化学路径:评〈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

② 政治心理学一直参与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辩论,比如“社会认同冲突辩论”及建构主义关于身份政治的讨论等。

③ 政治心理学对于战略行为、战略互动的心理学讨论,使战略研究得以细致化,谢林、杰维斯等研究也是这种路径。

④ 秦亚青提出“关系理性”的假定,参见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4—10页。中国台湾学者在吸收中国文化心理的基础上,提出“关系平衡”理论,参见 Chiung-Chiu Huang and Chih-Yu Shih, *Harmonious Intervention: China's Quest for Relational Security*,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4。

⑤ 前端创新与后段创新,是我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创新类型的区分。前端创新更多在核心假定层面的创新,而后段创新更多是竞争性的实证和中层理论解释建构。

第四,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丰富了中国国际关系的行动导向理论。秦亚青曾将国际关系理论区分为知识导向理论和行动导向理论,“知识导向的定义是指‘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是知识的积累、生产和再生产。行动导向的定义是指‘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指导行动”。<sup>①</sup>中国学者在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战略研究中形成的政治心理学理论,对于中国对外关系和中国战略互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以应用于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解决东亚安全问题等方面。<sup>②</sup>

### 三、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问题和不足

王:国际政治心理学存在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政治学和国际政治方法取向,另一种是心理学方法取向,您如何看待心理学方法在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中的地位?

尹:这两种政治心理学方法取向是长期存在的,有的偏向政治学,有的偏向心理学,但在不同时期,这两种取向的地位不同。西方国际政治心理学界早期较多使用政治和历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外交史或冷战史案例,<sup>③</sup>而目前心理学方法得到更多的使用,包括领导人的数据库、政策偏好测试等。中国学者对于历史案例分析运用政治学方法较多,对于计量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心理学方法运用不多。两种研究方法取向的选取与研究对象的不同有关,在研究集体政治行为等国内政治现象时,或者对领导人的对外决策等文本进行分析时,由于研究样本能够直接接触到,因此,更适合运用心理学的实验、定量和文本内容分析方法进行微观研究;在研究国际关系案例或者冷战史时,研究样本是很难直接接触到的,所以,更多采用历史案例方法进行宏观研究,相关外交决策、国际危机案例数量较少,因而更多是对领导人话语、外交政策文本进行定

---

①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7—13页。

②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非常注重对实践问题解决的意义,比如领导人交往、民族主义冲突、外交决策、恐怖主义、国际战略互动、领土争端等。关于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议题,可参见〔美〕戴维·霍顿:《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尹继武、林民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③ 初期的领导人人格研究都是历史案例研究方法。冷战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和学者,大多是运用历史案例研究方法。参见 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量内容分析。对领导人的政治心理学研究,传统上案例研究较多,<sup>①</sup>随着领导人人格测量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像操作码研究、人格的内容分析方法和专家问卷测试法都得到一些应用,比如关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操作码分析和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分析等。<sup>②</sup>

目前,国际政治心理学的趋势之一是将定量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等方法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在涉及政治行为的研究中尤为如此。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总体上处于政治学实证主义研究阶段,偏向于传统政治学的案例研究,而标准的心理学实验、测量等方法使用相对较少,不过,也有中国学者采用调查问卷等方法研究社会舆论与民意等。<sup>③</sup>

王: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存在哪些不足?

尹:从方法论角度来看,中国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中国学者在案例研究方面投入大量精力,比如研究外交史案例、领导人个体案例、重大国际性事件和国别比较案例等,采用的多为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而在比较案例研究的设计、变量控制等方面存在不足,对于外交史文献档案一手材料的使用不充分,访谈和田野调查力度不够。

第二,受制于交叉学科的特性,中国学者多为政治学背景,对于实验心理学和测量心理学等知识了解不多,在研究中对于心理学研究方法运用不足。但人性、性格和情感属于心理学中的隐性变量,而非经济等物质性显性变量,对于心理学变量的测量、收集、整理和分析,需要科学的心理学方法作为支持,不然将会导致研究的精确性和科学性不足。<sup>④</sup>

第三,中国学界的大部分研究仍停留于传统案例研究阶段,比如外交史的

---

① 张清敏对中国领导人的个性及其国际关系影响,属于定性的内容归纳法。参见张清敏、潘丽君:《类比、认知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54—72页;张清敏:《隐喻、问题表征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2期,第81—100页;张清敏:《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第93—119页。

② 冯慧云:《中国是现状改变国吗?基于信念体系操作码的解读》,《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36—58页;冯慧云:《防御性的中国战略文化》,《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23页;尹继武、郑建君、李宏洲:《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第15—22页。

③ 韩冬临:《想象的世界:中国公众的国际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谢韬:《从民意调查看中国的对美外交和中美关系》,《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第63—75页;张传杰:《中国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第49—58页。

④ 当前在民意、舆论和态度调查研究中,有较为系统的科学方法和测试,但在人格、认知、情感、认同等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心理学方法运用得尚不够多。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注重宏观而忽视微观的研究传统,加剧了这种对微观方法和技术的忽视,反而认为过于心理学化会导致研究解释力下降。产生该问题的原因不仅来自学科传统,也来自研究者对于方法掌握不足而采取的认知平衡。

研究等,属于定性研究,对当前西方比较前沿性的定量研究跟进不足,比如在实验心理学、测量心理学和领导人政治风格的操作码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缺乏科学方法和手段的运用,更没有去发明或创设特定的研究技术和方法。<sup>①</sup>

第四,在大数据时代,政治心理学研究开始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扩散,而中国学者大多集中研究高级政治问题,比如国家战略安全、领导人个性、外交决策和领土争端等,对于社会舆论、精英和民众的政治心理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信息化和全球化使得国际政治深入到社会之中,普通民众也可以通过网络等多种方式影响国际政治,比如,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社会精英在互联网平台上持何种政治态度,就值得研究和引入新的大数据分析技术。此外,相关的政治心理学数据库并没有受到学术研究的重视。雪城大学赫尔曼(Margaret Herrmann)教授建立了系统的领导人政治心理学数据库,也发展了相应的远距离领导人人格测试方法,中国学者在数据库和分析工具的研究和创造方面显然是需要更大的投入。<sup>②</sup>

王:除方法论外,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还有哪些问题?

尹: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存在三个方面问题。

第一,缺乏对国际政治心理学知识谱系的系统了解,难以在知识谱系中找到自己的坐标。比如,相关国别与区域研究学者提出研究领导人人格的议题,更多从现实角度出发,但不了解之前的人格理论是怎样的,也没有系统运用人格研究方法进行测试,更多是感想和经验式概括,不能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准确定位,知识创新意识不够。清晰准确的定位,与西方既有理论进行对话,对于理论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仅有个案式研究不足以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第二,中国外交研究中运用政治心理学存在困难。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需要回应中国对外关系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中国的对外决策和战略互动进行微观研究和分析,但由于中国的决策材料比较离散、不够系统,并且存在政治敏感性的问题,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存在一定困难。中国学者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并对中国经验和西方经验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实现了理论创新,但对中国经验的普适性缺乏理论论证。比如,关于

<sup>①</sup> 关于政策偏好分析、定量文本内容分析,参见 Göran Broström, *Event History Analysis with R*, New York: CRC Press, 2012; Janet M. Box-Steffensmeier and Bradford S. Jones, *Event History Modeling: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Hans-Peter Blossfeld, et al., eds., *Event History Analysis with Stata*,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7。

<sup>②</sup> Jerrold M. Post, ed.,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面子”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是否具有独特性,有学者提出意见,认为“面子”是一种基本的人性,其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表达方式,而不能说它是人性的根本差异;同时,中国经验是否同时适用于东西方世界,也有待论证和说明。<sup>①</sup>

第三,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与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话不足。这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学者的研究较为离散,多为问题解决式的案例分析,在与西方主流学界的理论对话和研究议题对话方面存在提升空间,比如,在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对外战略、周边国家领土争端问题、地区安全问题等热点问题上,政治心理学需要进一步介入,并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预测。

#### 四、对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评估与未来发展方向

王:您认为,与国际学术界相比,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目前处于怎样的阶段?

尹:从总体上看,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议题和理论进步很快。中国学者的研究横跨了西方不同阶段的议题,覆盖了从人格、认知到情感等各个方面。中国学者从引进和消化西方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到实现理论创新,只用了大约20年时间,中国学者提出国际政治的演化心理学理论等已经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sup>②</sup>

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所运用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心理学理论相对集中,既与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同时也对战略决策、外交决策理论有所呼应;在心理学理论上,对于人格理论、情感理论、认知理论、群体关系理论和身份理论研究比较多,但研究议题较为分散,对战略互动、对外政策、领土争端,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均有涉猎,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热点研究问题集合。

从研究趋势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学者和有心理学教育背景的中国

---

① 尹继武:《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心理文化学路径:评〈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

② 唐世平对于演化心理学的理论构建及国际安全的社会心理学的讨论获得国际学界的高度认可,参见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在大理论建设方面,尚会鹏运用心理文化学进行的国际关系理论思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而张清敏对政治心理学与中国外交的系统研究,为理解中国外交创造了独特的微观视角。

际政治学者的加入,中国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也将越来越多地引入心理学研究方法和路径。

王:您认为未来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需要在哪些方面拓展和加强?

尹: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要对西方国际政治心理学知识体系进行完整介绍,使中国学者能够了解自己的研究在知识谱系中的定位,加强对前沿理论的追踪和对话,提高创新意识,为搭建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学科提供基础。对于当下中国政治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热议的中国话语和理论问题,我个人倾向于理论的普适性和文化的独特性相结合。如果基于强烈的差异和独特目的,去创设一个非要与国际主流理论不同的话语体系,这过于受到价值偏见的引导,反而不利于理论创新。基于人性是相通的,人性差异只是程度差异而非本质差异的假定,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方法,均需遵循人性与政治差异本身的逻辑。第二,提高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者的心理学知识储备,推广心理学实验、定量分析等必要的研究方法,吸引更多有心理学背景的研究人员加入该领域,促进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实现精确化和科学化。第三,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议题较为松散,应该向相关研究议题聚拢,形成一些核心议题,比如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恐怖主义研究和国际冲突与战争研究等,同时,应该深入探讨中国经验/中国案例在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普适性问题。<sup>①</sup> 第四,加强学科的制度性建设,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常设机制,在课程建设、学生培养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通过召开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论坛、编制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年鉴、开展国际交流等方式促进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发展。

---

<sup>①</sup> 其实,一个更具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应该对当今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以及中国对外关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有深入的介入和回应。从政治心理学的学术研究属性来看,其实它的理论创新是来源于基于现实问题的学理研究。所以,政治心理学不是不关注现实问题,恰恰对于分析和理解现实,政策和对策分析应对有着重要的价值,比如当今全球的独特领导人、选举心理、恐怖主义、国际争端和安全热点问题中的战略决策和互动,都有着应用的空间和政策启发。